

说龙道凤集

周修强 著



SHUO LONG DAO FENG JI

龙道凤集

——读史札记

周修强

人民日报出版社

说龙道凤集

——读史札记

周修强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5.75字数118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定价1.80元
ISBN 7-80002-152-1/1.56

自序

少时喜爱数学，一度迷上文学。阴差阳错，进大学学的却是历史。当了几年研究生搞的又是古代。离开学校，任职于新闻机构。长期从事理论编辑工作，近十年任评论员，专事政治评论，把原先的专业几乎全部撂下。然积习难改，不时读点古书，时间精力有限，难以深入研究。既无特定目标，又无课题任务，信手拈来，随意翻阅，偶有所得则喜。窃以为值得公诸于世者，辄命笔，多以读史札记、随笔形式发表于报刊。十年所得，筛选后汇集于此。内容较杂，经济、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化艺术、神话传说……均有所涉及。性质各异，或为史实辨正，直抒己见；或论述史事，以史为鉴；或纵论古今，古为今用；或传播知识，赏心悦目。既无中心，无以名之，以集中一文题名之，曰说龙道凤集。编入的文章，除少数文字稍作修改及发表时编辑因版面限制删节过苛处稍作补缀外，一概如旧，以发表时间先后编排。是为序。

1988年3月

目 录

嘲弄历史必受惩罚

——江青与吕后·····	(1)
《劝进表》和“劝进书”·····	(7)
“文须有益于天下”·····	(11)
说“讳”·····	(15)
封建时代的外戚及其祸害·····	(18)
“五刑大夫”、韩信与人才学·····	(24)
“青天”小议·····	(26)
读曹操一个手令有感·····	(29)
应当允许人才相对流动	
——从历史看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	(33)
邹容、“苏报案”及《革命军》·····	(39)
写好自已的历史·····	(48)
羿·后羿·奔月及其它·····	(50)
司马徽的难言之隐·····	(52)
想起了何晏的好处·····	(54)
人未必如文·····	(56)
“艺痴者技必长”·····	(58)
说冯道·····	(61)
长城、秦始皇及其他·····	(65)

郑玄让稿	(70)
也说“矫枉过正”	(72)
板桥读书法	(75)
“七品官耳”	(79)
消除“清高”未必好	(82)
“刑天舞干戚”	(85)
“谄谀之至，则吾岂敢”	
——从郑板桥评诗说起	(87)
说龙道风	(90)
从顾师言到聂卫平	(94)
“切于实用”与“自出己意”	(97)
“此非求谏，乃拒谏也”	(101)
曹操用人并非“唯才是举”	(104)
“吕端大事不糊涂”	(109)
刑与法的等同及其后果	(111)
宋太祖不啻于酬功	(115)
“立言不为一时”	(118)
何晏的悲剧	(121)
史官的监督机制	(125)
“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	
——读应詹的《为江州临行上疏》	(129)
毕竟是宋祖	(133)
洛阳缘何纸贵	(138)
孔融之死	(141)
“不敢以私害公”	(147)
呆不可信的殷洪乔	(151)

陶侃和他的母亲·····	(153)
存贤、弹劾不为私·····	(156)
君臣之义及其衍化	
——封建社会的上下级关系·····	(159)
“文人之巨患”·····	(166)
“文章当从三易”·····	(169)
汉初三杰的功业与结局·····	(172)

嘲弄历史必受惩罚

——江青与吕后

历史是无情的，谁嘲弄历史，篡改历史，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搞破坏活动。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却将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百般美化许多帝王将相，借古喻今，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所说的法家人物中，江青特别看中了吕后（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她到处吹嘘，说什么“吕后也是个法家”，说吕后“是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了不起”，说她“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法家的组织路线”，等等。《法家人物介绍》最初发表的时候没有把吕后单独列出来，只在介绍刘邦的一条里附带提了一笔，江青很不满意，说“吕后要作一条单独宣传一下”。于是，为“四人帮”效劳的梁效、罗思鼎之流，纷纷上阵，抛出一篇篇文章，为吕后歌功颂德，要把她打扮成一个无比伟大、无比英明的女皇帝。

可惜，史书上对吕后有“佐高祖定天下”的赞语，但并无实际内容，是虚美之辞。具体提到吕后这个“法家”功绩的地方实在太少。这可难煞了那班“秀才”，不得不挖空心思来制造吕后的“丰功伟绩”。

罗思鼎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从军事实力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乎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你看，如果没有吕后领导关中，刘邦就只能垮台了，吕后的功劳岂不“伟”乎哉！

关中对前线的支援，是不是真有其事？是有的。关中根据地的支援对于刘邦取得胜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刘邦曾经说过：“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刘邦是把这项功劳记在萧何名下的。既然以“历史权威”自居的罗思鼎硬要把这项功劳记在吕后帐上，我们不妨查查历史，看吕后在楚汉相争那几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公元前209年，刘邦在沛地起兵反秦，吕雉留在家乡，没有出来。公元前205年，项羽在彭城大破汉军，刘邦带了几十个人逃出来，要到沛地去接家属，可是他的父亲和老婆已经逃走了，半路上被楚军抓去，留在项羽营里，当了二三年俘虏。到公元前203年，楚汉以鸿沟为界议和，项羽才将吕雉和太公送还刘邦。直到这时候，吕雉才和刘邦在一起。她有没有到关中去？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吕雉回汉以后，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就在乌江自杀，刘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楚汉相争的重要时刻，吕雉在项羽营里当俘

虜，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史学界的“南霸天”罗思鼎，却说她那时候在关中领导萧何为刘邦建设根据地。这样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恐怕连那个说“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胡适，也要自叹不如了！“四人帮”一贯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把别人的成绩统统归于自己，他们把萧何的功劳记在吕后帐上，把吕后捧上天，不就是为了把江青捧上天吗！

梁效、罗思鼎这伙历史的伪造者们大肆鼓吹吕后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她“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说在刘邦死后，吕后统治时期，“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都受到了重用，被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这就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既然他们这样宣传，我们也打开历史，讲点刘邦死后吕后做了些什么的故事吧。

史书记载，刘邦临死的时候，吕后和刘邦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我所知也。”（《史记·高祖本纪》）

梁效、罗思鼎根据这段话大做文章，他们说：刘邦死后，吕后完全遵照刘邦的遗言，重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这些法家人物，因此组成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保证

了法家路线”。

事实是这样的吗？请看历史：

公元前199年，刘邦刚去世，吕后就迫不及待地要篡权，她秘不发丧，阴谋一举杀害辅佐刘邦的功臣宿将。只是因为当时陈平、灌婴带兵十万守在荥阳，周勃帅二十万大军在代地，她不敢发动。

萧何死后，曹参当丞相，他不敢得罪吕后，只好日夜在家饮酒，做了三年不干事的丞相。

公元188年，刘邦的儿子刘盈（惠帝）死，吕后找了一个小孩子当小皇帝，她自己“临朝称制”，当起皇帝来了。她还不放心，就指使人对当时的丞相王陵、陈平说：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怕你们，你们如果请太后任用她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当将军，掌握禁卫皇城的南、北军，让吕氏家族进宫掌权，太后才可以心安。王陵、陈平只好依从。从此，吕氏篡夺了军政权力。

这样还不够，吕后要封她的侄子做王。右丞相王陵反对，他说，高祖曾杀了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要封姓吕的为王，就是违背了高祖的盟约。吕后很不高兴，就不让王陵当丞相，以病免归家。陈平虽然当了右丞相，吕后另派她的宠臣审食其当左丞相，“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史记·吕太后本纪》）。审食其和吕氏家族专权，“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只能挂个空名。吕产、吕禄等掌握了军权，让周勃当个空名太尉。

他们说的法家人物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在吕后统治下的实际遭遇就是这样。

吕后排斥了刘邦旧臣，大封吕氏，封诸吕为王，连她

的妹妹吕须也封侯，完全违背了刘邦立下的“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盟约。公元180年，吕后病重，安排后事，让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北军，吕产掌握南军。临死，吕后还不放心，再三叮嘱吕产、吕禄，要他们一定牢牢掌握军权，一步也不要离开，连送丧也不要去，以免大权被人夺去。她死后还留下遗诏，让吕产当相国。这样，就造成了上将军吕禄和相国吕产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局面。刘家的天下眼看就要变成吕家的天下了。

就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候，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以及朱虚侯刘章定计，一举夺取了吕产和吕禄的军权，消灭了诸吕，恢复了刘家天下。刘邦临死前所说的“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得到了证实。这也就说明刘邦临终前已经看出吕后要篡权，他把希望寄托于周勃，要他安刘家天下。周勃没有辜负刘邦的期望，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周勃就是这样一个人。诡计多端的江青，竟然指定梁效写文章，专门讲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当皇帝的。如果“四人帮”垮台得晚一些，那批为他们舞文弄墨的文人，是会炮制出那样一篇绝“妙”的文章来的。

什么吕后执行的“法家政治路线”，原来就是这么一条篡权夺位的政治路线；什么吕后执行的“法家组织路线”，原来就是这么一条重用吕氏、排斥刘邦功臣的组织路线。吕后加上吕产、吕禄、吕通，也可以说是二千多年前的一个“四人帮”吧。

江青一心想把二千多年前吕后的篡权活动，乔装打扮，说成是正确的“法家路线”；这无非是借古喻今，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我们看看历史记载，还历史以本来

面目，也就可以把她的画皮剥掉，还她本来面目——她就是妄图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江青要梁效编写“吕后按刘邦既定方针办”的资料和文章，为她上表劝进。

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下了立即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76年11月20日)

《劝进表》和“劝进书”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王张江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十万火急地从故纸堆里翻出晋朝刘琨的《劝进表》。为什么“四人帮”对一千六百多年以前的刘琨及其《劝进表》，有那么大的兴趣呢？

这是“四人帮”的“古为今用”。他们要把刘琨的《劝进表》作为样板，如法炮制“效忠信”、“劝进书”，拥立江青登基当“女皇”。

我们先看看刘琨写《劝进表》是怎么回事。

西晋末年，农民不断起义，统治阶级内部混战，社会矛盾激化。当时，早已徙居中原的西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暴动。公元304年，匈奴族人刘渊自称是汉高祖的后裔，据离石，自立为汉王。公元308年，汉王刘渊称帝，国号汉。公元316年，刘渊子刘聪派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

公元317年6月，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率领河朔诸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要他登上皇帝宝座，这封上书，就叫《劝进表》。

刘琨的《劝进表》的中心内容是：“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这是说，天帝不亡我们晋朝，

一定会给我们一位君主，继承晋朝帝位的，不是你晋王，又能是谁呢？我们根据天帝的意旨，百姓的愿望，冒着死罪，请求你进位称帝。

刘琨上《劝进表》时，那个投降了的晋愍帝还没有死，司马睿不敢立即接受帝号，但“优令答之”。

刘琨上书后五个月，晋王司马睿加封“刘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如故，并赠名刀。”一劝进，即加官进爵，真是“立竿见影”。

晋愍帝被杀后三个月，公元318年3月，司马睿即皇帝位于建康（今南京），是为晋元帝。司马睿一登上皇帝的宝座，立即把所有签名上书劝进的官员“加位一等”，平民上书者封官，总共二十余万人。当时有人反对，司马睿置之不理。凡是上表劝进的，有官的加官进爵，无官的也弄上了一官半职。

刘琨的《劝进表》十分强调“昏明迭用，否泰相济”。意思是，前一个皇帝昏庸，继承的就是英明的君主；前一代混乱衰蔽，下一代就安定繁荣。

“四人帮”在北京两校的黑干将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效忠信”，并疯狂地叫嚷：“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丰功伟绩”是幌子，要少写，这不是学着刘琨“昏明迭用，否泰相济”的腔调，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那个连做梦也想“黄袍加身”的野心家江青吗？

9月23日夜，姚文元亲自出马，布置一个单位给野心家江青写“效忠信”。姚文元说：“你们给江青同志写一信，

表示你们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信写好后经我转。”这个单位给江青送信十分方便，但是一定要经姚文元的手转，可见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当时，叫嚷得最厉害的是伪造的指示，即“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要这个单位写上“坚决按主席指示办”，就是要他们向江青表忠心，按“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办，拥护“四人帮”来“改朝换代”。

个别坏家伙在“劝进书”里，反对党中央，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王洪文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有一封“劝进书”说得更肉麻了，说什么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这付无耻的调门，不正是从刘琨那里学来的吗？刘琨在《劝进表》里说：“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这个无耻的劝进者也等不及了！

“四人帮”搞“劝进书”的念头，不是1976年9月才突然冒出来的，远在1974年初就流露过。那时，野心家江青和吹鼓手姚文元在清华大学演了一出双簧。这两个家伙一吹一打，互相唱和，胡说什么“武则天……为什么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广泛的社会基础”。“四人帮”早就想演出“劝进”这出丑剧了，只是时机未到。

毛主席逝世，王张江姚一帮以为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于是，手忙脚乱地这里组织，那里下令，指使别人炮制尽可能多的“效忠信”、“劝进书”。

尽管“四人帮”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写“效忠信”、“劝进书”的人却少得可怜。足见“四人帮”极端孤立，极

端不得人心。他们的社会基础，只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那一小撮。

“四人帮”满以为“效忠信”、“劝进书”能把江青拥上“女皇”的宝座。江青得意忘形，准备粉墨登场；“四人帮”的亲信喽罗们也很乐了一阵，以为“弹冠相庆”指日可待。焉知“女皇”没当成，反而多添了一个篡党夺权的罪证。

(1977年2月8日)